

# 内地缘何也现“招工难”

本报记者 余英茂



眼下很多企业却遭遇“招工难”

## 核心提示

“外出务工兄弟姐妹，河南妈妈喊你回家”，10月7日，郑州火车站广场出现的这样一幅标语，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标语的背后，反映出一个不争的事实：过去似乎与“招工难”不沾边的河南等内地省份，如今也遭遇了“有岗无人”的烦恼。

然而，另一方面，街头茫然地四处找工作的求职者并不鲜见，职场似乎存在一种有事无人干、有人无事干的“两难”怪圈……

## “招工难”席卷内地

10月7日，郑州火车站广场，郑州大学升达管理学院16名大学生组成了一面标语墙，他们T恤上的蓝色大字“外出务工兄弟姐妹，河南妈妈喊你回家”吸引了众多眼球。“河南的一些企业已经出现招工难，我们这样做是呼唤民工兄弟留在家乡作贡献。”活动的组织者说。

“我们河南也出现了‘民工荒’？”面对此情此景，有人不解地问。

据媒体报道，近期，珠三角、长三角等我国沿海地区又相继出现“招工难”，深圳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浙江7月份用工缺口达25万人，广州市劳动保障部门前不久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七成受访企业有招工意向。

眼下，伴随着经济形势逐渐回暖，“招工难”也悄然席卷内地。

9月21日，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报道：就连传统的民工大省四川也出现“招不到人”的局面，部分建筑企业开出了5000元的月薪吸引建筑工人。

10月12日，河南省人力资源市场发布9月人力市场情况称，目前我省多个行业遭遇了“招工难”，其中，机械制造、服装加工、电子装配、餐饮服务四种行业缺口最为严重，操作工、营销人员、营业员、缝纫工、计算机硬件、装配钳工、内勤、焊工、营销经理、数控机床十大工种最缺人手。

据统计，9月参加省人力资源市场现场招聘和委托招聘的省内用人单位308家，提供各类岗位4166个；省外用人单位120家，招聘岗位68796个，报名求职者仅为7600人。为了应对“招工难”，省人力资源市场10月中下旬先后安排了3场大型招聘会。

“招工难”突出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缺口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在郑州街头，记者见到很多宾馆、饭店等服务型企业门口都贴着招工启事，二七区一家服饰有限公司的王经理坦言，当前郑州不少服装企业都出现了用工缺口，速冻食品、汽车制造业也急需人手。

随着企业的用工需求迅速攀升，面对“有岗无人”的局面，不少用人单位降低了对求职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的要求。郑州一家知名速冻食品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士感叹：“以前招工我们只招未婚青年，由于近一段企业用工大量增加，现在不但年龄放宽到了16~35岁，结过婚、有小孩的也可以接受，甚至身体健康、会写字的人也行，就这还招不来人！”



一声呼唤反映出“招工难”现象(资料图片)

## “招工难”原因何在

众所周知，河南系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第一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为什么也会出现“招工难”呢？

专家指出，目前我省企业的“招工难”现象，有着阶段性的偶然因素。省人力资源市场职业部部长崔秀池认为，往年，三季度是我省人力资源市场的劳动力供应“充足期”，企业没有遇到过用工难问题。今年却截然不同，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上半年我省用工需求下降，大批农民工到外地打工，逐步实现了异地转移就业，免除农业税等惠农政策的实施，也吸引了部分外出打工者回家务农、自主创业。随着经济复苏，我省企业第三季度用工数量“反季节”地大幅度增加，使得招聘企业多而求职者少，不少企业也像沿海城市的企业一样遭遇“招工难”。

薪酬偏低，也是导致企业“招工难”的一大原因。在人力资源市场，正在查看招聘信息的郑州大学2009届毕业生李凌说：“虽然目前招人的单位很多，但是有几家企业能把工资开到2000元以上的？一个月拿这么点薪水，除去房租、吃饭等日常开销，手里还能剩下几个钱，所以有工作机会但工资太低的，我也不想干！”

在采访中，很多存在“招工难”的企业，却不愿意让记者在媒体上透露企业的名称，微妙之处在于他们给工人开的工资比较低。记者注意到，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多数岗位的工资基本都在1000元左右，最低的只有几百元。谈到“招工难”现象，求职者刘女士认为，一些用人单位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千方百计想降低用人成本，不但工资较低，经常采取增加

工作量、延长工作时间的办法来增加利润，在市场形势好的时候工人节假日也不能休息，有时还恶意拖欠工资。员工如果没有休闲和进步的空间，不受尊重，缺乏归属感，企业“招工难”也就在所难免了。

求职者的看法也得到专家的认同。崔秀池分析说，一些缺人的行业，员工往往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对求职者年龄有一定限制，符合条件的年轻人多数不愿意干这样的工作，这样就造成了用工短缺。

前段时间发生的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使打工者的职业病防治问题受到公众关注。有些用人单位的劳动条件较差，工作场所的粉尘、噪音、有害气体污染严重，不给职工办理社会保险，职工的福利待遇差，缺乏安全感。

如今，很多农民工已不把挣钱当作外出打工的唯一需求，尤其是“80后农民工”，他们既想打工挣钱，又想见世面、长本领，求得自我发展。来自信阳的农村务工青年张秋生告诉记者，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正在日益增强，他们求职不仅注重工资的多少，还对职业前景、安全卫生、休息时间等十分关注。这些正常的要求如果企业不能满足，他们往往会“用脚投票”，不会为其打工。

## 招工与求职“两难”并存

就在用人单位在为招不来人烦恼的时候，很多求职者却在为找不到工作而奔波。

据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测算：今年我省城镇劳动力供给总量达210万人以上，全省GDP预计增长10%，按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新增就业8万人计算，经济增长只能创造80万个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的20万个岗位，预计今年我省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00万个左右，城镇劳动力供求总体缺口在110万人以上。从整体上看，我省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王伟说，今年参加省人才交流大会的企业和求职者都比去年多，却出现了“找工作难和招工难”的双重难题：一方面是大量的求职者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大量的企业招不到想要的人才，求职者和企业陷于两难。

尽管今年我省举办的人才交流活动规模很大，效果却并不明显。国庆长假过后，省人才市场举办了又一次人才招聘大会，效果也并不理想。王伟认为，每年都有大量的应届毕业生涌入社会，这些年我省已累计了上百万高学历的求职大军，今后，“找工作难和招工难”的双重难题有可能愈演愈烈。

目前我省出现的“招工难”在很大程度上是“招技工难”，属于用工的结构性短缺。

记者了解到，虽然目前我省服装行业普遍招工，但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最需要的还是有一定缝纫经验、马上能带来效益的熟练工，

尤其是技术类人员最“吃香”。目前很多求职者自身素质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这也是造成企业“招工难”特别是招技术工人难的原因之一。中原区一家服装企业的人事主管向记者诉苦说：“我们招聘机械修理师的信息在人力资源市场挂出了一周了，来报名的人不少，却没有发现能够胜任的人选。”

## 河南要喊务工者“回家”

目前，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我国很多省市都出现了“招工难”，这种现象还有加剧趋势。对此，有人不免担心：“招工难”会成为长期困扰内地的新课题吗？

毋庸置疑，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企业长期以来享受的廉价劳动力“低成本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崔秀池认为，近年来，受我省各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吸引，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入驻内地，河南迈入了工业大省行列，各地新办企业、新项目日益增多，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用工数量将逐渐增加。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企业用工需求缺口很难立即补足。

化解“招工难”，企业应当从改变用工观念上着手。求职者刘女士建议，企业除了提高员工的工资待遇，还应当注重人性化，像深圳的一些企业借鉴韩国、日本等国家的用工制度，给外来打工夫妇提供单间，就很受务工者欢迎。企业有了凝聚力和吸引力，就不会发愁招不来人。

招工与求职“两难”现象背后，是劳务信息不对称。省社科院的一位专家认为，“企业和求职者都很盲目，企业的用工需求得不到满足，求职者得不到用工信息，双方缺乏一个有效的信息对接平台”。

据了解，为了破解招工与求职“两难”，全国多个省市已开始联手建设跨区域的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平台，打造“不落幕”的跨省招聘会。重庆市多个部门联手打造“政府引导、企业参与、政策扶持、市场运作”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模式，建立劳务信息呼叫中心和劳务电子商务平台。我省也急需打造劳务供求的信息沟通渠道和平台，解决供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十分重视发展劳务经济，输出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在当前沿海地区的产业快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新情况下，我省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逐年增加，如果优质劳动力继续大量外流，那么，“招工难”势必会成为一个长期困扰我省企业的问题。

“外出务工兄弟姐妹，河南妈妈喊你回家”，这声呼唤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一家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士无不担忧地说：“多年来，我省的很多技校都和沿海地区的企业签有协议，我们一直在给外地培养、输送大量人力资源。在搞好劳务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把优质的人力资源留在家乡作贡献！”

# 新闻时评

## 像呵护眼睛一样呵护善良

近日，湖北荆州为救两名落水少年而献身的三名大学生出自道德自觉的舍己救人行动，在感动中国的同时，引出了一场“救人值不值”的讨论。陈及时、何东旭、方招——人们记住了这些名字，就像20多年前，社会对为救溺毙老人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大学生张华的评价，带着钦佩、赞叹，也夹杂了不解与惋惜。

由一次救人行为而引发社会价值观的讨论，这几乎是当今社会舆论的寻常情境。就在今年10月5日，广东韶关南雄市发生学生溺水意外，一名16岁的女生不慎跌入10米多深的水库，同行中有四名男同学下水相救，落水女生被救起，但四名男生全部不幸遇难。此事同样也引发了一场所谓“值与不值”的争论。

这一次次的“值与不值”的争论，不是简单一句社会价值多元就可以概括。那些几乎与我们市场经济相伴而来的所谓道德争论背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今天，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更要注意在道德建设上快速进步。比如，将道德论斤两，把经济利益作为衡量人和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此，人们才会质疑三名大学生救人的社会效益，才会扳着指头比较三名大学生与两名少年的培养成本，才会将生命当作算数题，用加减乘除换算善良的价值。

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判断标准并不仅存于民间，它甚至被堂皇运用到法庭之上和行政管理当中。前有南京彭宇案的法官判词，“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后有上海原南汇交通执法大队某官员质疑孙中界行善之举的经典语录：“没有利益触动，我(车主)为什么会帮你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同样亦能为社会道德建设打下深厚的物质基础。今天广泛推动社会发展的公民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等等，都是市场经济发展下的精神果实。但是，当我们对物质利益追求过度，把市场经济的原则放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迅速蔓延，则将人们引入物欲横流的泥潭。

从人类文明进程来看，历史大变革所导致的社会道德悖论在所难免，问题是，这样的悖论还将持续多久？有人说，三名大学生救起的不仅是落水少年，还有社会道德，此言极是。纵观人类历史，因物欲横流、私利至上而致权力腐败、败家毁国的事例不胜枚举，而今天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也可以看成是物欲横流社会的历史周期性警告——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刻不容缓。

让我们像呵护眼睛一样呵护善良，用一颗颗善良之心激活社会良知。 郝洪

## 认识的模板

新闻：《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寂静钱钟书》一文被选为福建省2009年高考语文阅读题，作为作者的该报前实习生周南(化名)自己试做了一遍，总分15分中只拿了1分。一个被作者认为“说出了我内心最真实意图”的选项，参考答案是错的。(10月29日《中国青年报》)

人们的视角不同，得到的观察和认识会不一样，此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周南的答题其实是一个反讽，阅读理解作为主观题，参考答案是以出题者的立场作出，阅读材料的作者现身，在参考答案面前得到低分，真假美猴王，该怎么分辨，所谓参考答案的荒诞立现。

阅读理解在高考框架内，作为一个构件，它肯定是要考查学生某种能力。但想法因人而异，难分对错，参考答案设置的前提是学生的回答要依照它，通过偏离或符合它的程度而给出一个分数，而这个分数就表现在他的语文总体分数。

## “被捐款”换编制背后的权利断裂

权力在乱拼，规则在让路。在法治无法触及的暗角，权力总是恣意地寻找着寻租空间。这次，权力寻租的触角伸到了河北威县——该县前不久择优录用191位应届大学生充实到中小学的教学一线。知情者爆料称，在新教师工作不久，校方要求他们捐款二万到五万，换取正式编制。(10月28日新华社)

以“捐资助学”的名义让新教师捐款换编制，威县教育局此举与前频发的教师“上岗费”如出一辙——要上岗，除了要穿越可能铺着“吃拿卡要”权力关卡的考试选拔，还需缴纳一笔可观的“上岗费”。有人说，正是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才让威县教育局在求职者捐款换编制上肆无忌惮。

毋庸置疑，在当下经济危机中，用人市场的确出现了供大于求的情况。在人们“求职若渴”的语境下，权力寻租可以以更从容地将触角伸入职场的更深处。纵观现实，这并不仅存于威县的“被捐款”上岗，似乎还有着更广阔的意蕴：它除了是获取普通职位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是通过“买编制”获得同岗员工难以企及的更高工资，甚至可以解读为“买户口”在城市的核心阶层中“上岗”，从而享受以前不曾有过的户口福利。

谁掌握着标准，那么训练、技巧可以教人把握其中的规律，思维能力本身的面目已难以辨识。

文/肖擎 漫画/曹一



“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酬”的权利断裂，才让“上岗”、“编制”的另一面成为权利荒漠。人们是通过权钱交易这条逼仄的通道，换取“上岗”的门票。

社会权利断裂而又法治不彰之处，自有公权力越界野蛮生长。在这样的权利断层暗角，因为有着公众对自我权利救赎的强烈渴求，有着权力蔓延下规则的无条件让道，才有了河北威县教育局部门面对“被捐款”质疑的断然否认，更有了河北武安前教育局局长离任前突击签署“数百教师调令”的肆无总惮。可是，在权力一片乱哄的现实面前，谁又来弥合公众权利的断层，谁又来编织法治规则的栅栏呢？ 李妍

## 同权法案 体现国民待遇的平等

“同票同权”、“同命同价”、“同工同酬”，正成为近日新闻媒体上闪耀的关键词。经由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努力，一个国民平权的时代似乎辉映在前。(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

无论这些“同”字打头的美好短语，一旦深植于现实，会显得多么可望不可即，但我们总要承认，它们代表了一种正确的和值得期待的方向。如果国家和政府果真愿意将国民平权进行到底，那么等待的过程便是可以被审慎接受的，相比某种“静谧的绝望”，背负着希望的生活显然要有意得多。

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所阐释的“从身份到契约”，曾被西方国家当做社会进步的范式。“同票同权”、“同命同价”和“同工同酬”，可资作为中国式的注脚。我们试图在选举权、生命的价值以及劳动的价值等层面，剥离“身份”的厚重裹挟，将自然意义上的“人”，或者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及其所蕴涵的那些核心的、不能被遮蔽、也不能被剥夺的尊严和权利，斩钉截铁地张扬出来。

这种张扬，与其说是一种进步，其实毋宁说是一种纠偏。因为在自然法的意义上，没有任何道理“同票不同权”、“同命不同价”或者“同工不同酬”。而我们之所以一度容忍这样的不公，普遍的解释是“深刻的社会背景”使然，带着一种历史的沉味。

如果我们愿意抱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似乎我们也只能尊重历史演进的崎岖逻辑。而今，经过九曲十八弯的沿革，历史和现实在我们面前展现了新的可能性，“同权”不仅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更是一项庄严的道德义务。

我们总要回到当初信誓旦旦的承诺，将国家与人民签署的契约重新擦亮，我们总要记得那些熠熠生辉的文字。回到承诺的原点，便是要回归宪法，回归“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重新发现和敬畏其价值。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具有非凡的庄严性和司法效力。但坦率地说，它被置置的处境是令人惊愕的。“同票不同权”、“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积非成是，谬种流传，及于今日，我们仍然不得不依靠实际上是“过度立法”的方式，去矫正、去重塑、去谋求理论上已经拥有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的国民平权。

有识之士曾提出要实现“宪法的司法化”，通过宪法诉讼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个人、尤其是受公权力的侵犯。但若干年来，鲜见立法部门回应，徒留“探讨”层面。而目前推出的一系列“平权”法案，应该说是向宪法致敬的开始，是立法机构重新回归被扭曲多年的各种法律和政策法规，将宪法从观赏性的处境中举重若轻地提携出来。

全国人大的“平权”法案，固然代表了一种难得的进步，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依然是抛开宪法的单兵突进。如何能从宪法本身出发捍卫宪法的尊严，立法部门的使命依然任重而道远。 若渔